

灯下学术文丛



孙
洁
／
著

世纪彷徨：老舍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序·····	陈鸣树	(1)
绪论·····		(1)
上编 抬头见喜:山东时期论 ·····		(1)
第一章 幽默背后·····		(4)
第一节 比较:幽默理论 ·····		(5)
第二节 个性:自由主义文学观·····		(14)
第二章 以悲郁为内核 ·····		(22)
第一节 国事难堪 ·····		(25)
第二节 文化思索 ·····		(31)
第三节 虚妄感:人生质询·····		(33)
第三章 绝望中的礼貌 ·····		(38)
第一节 适度机智,防止油滑·····		(38)
第二节 适度同情,疏离讽刺·····		(41)
第三节 适度优越,以免解体幽默·····		(43)
第四章 形成及定位 ·····		(53)

第一节 弱水三千一瓢饮	(53)
第二节 文学史定位：到底是不合时宜	(62)
中编 国家至上：抗战时期论	(69)
第五章 抗战改变了一切	(72)
第一节 “最大的问题”	(72)
第二节 不归路	(78)
第三节 国家至上	(97)
第六章 雾失楼台	(106)
第一节 “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106)
第二节 宣传至上	(120)
第三节 溯源	(127)
第七章 回归，1941（从创作角度看）	(134)
第一节 1941 年前后	(134)
第二节 回归幽默	(136)
第三节 回归北平	(138)
第四节 回归小说	(141)
第八章 论争·回归（从文艺思想角度看）	(146)
第一节 老舍和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	(147)
第二节 老舍和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与“民族形式” 问题的论争	(149)
第三节 老舍和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156)
第四节 归去来	(159)

第九章 纽结点:抗战时期评议	(165)
第一节 作为预备期:从抗战时期看新中国时期	(165)
第二节 作为潜伏期:因抗战时期论老舍之死	(182)
下编 西望长安:新中国时期论	(189)
第十章 狂喜中的改造	(192)
第一节 新社会的激动	(192)
第二节 思想改造:“捕老鼠不对吗?”	(195)
第三节 原因何在	(198)
第十一章 山重水复	(206)
第一节 月迷津渡	(206)
第二节 人物·语言·生活:迷途中的坚执	(211)
第三节 柳暗花明	(216)
第十二章 滑坡	(224)
第一节 西望长安不见“佳”	(224)
第二节 滑坡探因	(226)
第三节 回溯	(240)
第十三章 在运动的夹缝中	(251)
第一节 进退维谷之境	(251)
第二节 中心之外	(255)
第十四章 走向宿命:再论老舍之死	(261)
附录:老舍研究书目	(268)
(一)传记类	(268)

(二)资料类	(271)
(三)研究类	(282)
(四)辞书类	(293)
参考书目	(294)
老舍沉思(代后记)	(303)

序

陈鸣树

孙洁的《世纪彷徨：老舍论》是研究老舍思想发展脉络演变的一部写作极为投入和深入细致的论著。这也许是作者从中学时代起就热爱老舍，近十年来又广泛阅读了老舍及其研究的著作，朝夕寝馈于斯的结果，堪称是“十年磨一剑”的不可多得之作。

既然是梳理老舍的思想发展脉络，当然不得不以时间的推移为序列。在《绪论》中，作者解释了她的题旨，有一段以理性为旨归的深情文字：

彷徨是一种不定的状态。我以为，老舍一生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度过的。这并不是说老舍时时刻刻都没有主见，凡事犹豫。恰恰相反，老舍的个性是非常强硬的。这从他的断然投水即可以见出。老舍的彷徨，主要是一种文学理念上的冲突和某种必须抉择的压力造成的。这种文学理念上的冲突，指的是自由主义文学观和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矛盾；压力，则同时来自外界和内心：从外界看，20世纪动荡不居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老舍走过的那三分之二，不能容许自由主义文学因素健康发展；从老舍内心看，他的士大夫气质、国家至上主义、使命感、宗教情绪也都阻碍了他毫无

牵挂地安心做一个游离于时代命题、大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作家。

这里，将老舍与一般的民主自由作家作了比较，从而得出了老舍之所以为老舍的概括，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我曾认为，任何对个别作家的研究，基于研究对象无不处于无边无际的时代潮流的网络之中，要深入下去，必然走向超本体的比较意义。时间和空间中的无形和有形、无意和有意的比较方略确定了它的定位。作者还认为，她所指的“彷徨”，乃是具有“寻找”意义的彷徨。作者说：“老舍生命历程和文学历程的起伏，紧紧地系联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伏、中国文学史的起伏、老舍自己文学理念的摇摆，也正是这种包含了‘寻找’的彷徨的过程。”起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因成了本文的奠基。

本书随着历史的演进分为三编，即“抬头见喜：山东时期论”、“国家至上：抗战时期论”、“西望长安：新中国时期论”。山东时期是老舍创作的黄金时期。作者概括幽默为其总特色。老舍曾认为“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幽默中是有同情的”，作者结合其时的作品，概括了老舍的幽默是以“悲郁为内核”的。他从粉饰的太平中看到了人生的“缝子”与“笑料”。作者复从老舍的身世论证了他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山东时期独立不倚的个性品格显示于文字，成就了老舍的独特性。”在对老舍幽默的论证中，作者总结出了“必须在三个关节上掌握适度的原则”，即：“适度机智，防止油滑”；“适度同情，疏离讽刺”；“适度优越，以免解体幽默”。这也是作者自己的创获。

老舍的幽默虽然为他赢得了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失去了幽默,就没有了老舍”(樊骏:《认识老舍》),但是,老舍的幽默也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微辞,原因在于——正如作者分析的:“20世纪前半时的中国文学,因承受了更多的内忧外患,而主要显示出入世的与实用的形态。”因而幽默在一定程度上显得难以被认同或格格不入,当时需要的是直率的抗争或讽刺家式的冷嘲热讽;因而老舍的宝贵的幽默品格未免在某种程度上有“明珠暗投”之慨,问题是“生不逢时”。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时期出现了“老舍热”,对他的幽默就有了特别的倾心。作者的结论是,当时老舍的幽默“到底是不合时宜”,可谓是切中肯綮之言。

接着便来到了“国家至上”的抗战时期。老舍以空前未有的热忱,以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行动和国家至上为驱动力的功利主义写作方向重塑了自己的文学品格,其间也经历了“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作者以诗意的语言恰当地称之为“雾失楼台”。在这里,作者从创作和文艺思想的角度总结了老舍在这一时期的得失。

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平面地总结这段历史,而是把抗战时期作为老舍一生的一个重要纽结点。作者认为:“通过这个纽结,我们得以更为清明地理解老舍的最后十七年的文学道路,也更为理性地读解老舍之死。”

《西望长安:新中国时期论》是本文的重点,以老舍的剧本“西望长安”作为本时期的题名,是作者含义多重的一个巧思。“西望长安不见家”,原为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诗中的一句,隐含着“报国无路,壮志难酬,西望帝都,不见归途”之

意；老舍以此为一个肃反剧本的题名，而且正如作者自白，这个剧本“不佳”，这样一来，就变成了“西望长安不见‘佳’”。联系到老舍之死，作为一种隐喻，这题名便显示了多重的含意。

发轫于抗战时期的功利主义，到了新中国时期，便激发了“狂喜中的改造”。老舍终于成了“作家”中的劳动模范，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于是便产生了可悲的艺术上的大面积的“滑坡”。老舍，作为伟大的作家，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单凭一部《骆驼祥子》，一出《茶馆》，一篇《月牙儿》，或是《我这一辈子》，写得够多棒，足可以比美萧伯纳，追步契诃夫，北京人说话那叫‘盖了帽儿’。”（王行之：《我论老舍》）我们万万料不到老舍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竟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为了表示对一位大作家的痛惜，我们不妨引述这样的文字，以示历史的鉴戒：“热爱猪，不辞劳，/喂食、饮水、冷热饥饱，时刻仔细瞧。/粪便干，或是不爱动，/立刻去找防疫员来快治病。/……/有成绩，戒自满，/一定要站得高来看得远。/看得远，站得高，/时刻不忘比学赶帮超。”如果不署名，谁也不会想到这会出自大作家老舍的笔下。某种权力话语竟可以如此扼杀一个作家的灵魂，扭曲他的才情，使他在创作上无路可走。

当然，这里还有作者从老舍的“月迷津渡”到短暂的“柳暗花明”的非常细致的论述。然而经过“横扫一切”的残酷浩劫，老舍终于走向他的宿命——死亡。作者认为，老舍之死在于他性格上的脆弱和过于豪情万丈，于是在外来的打击下，缺乏理性的支柱，一下子坠于无地。老舍失去了生命价值的依托，只得以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它既是殉难，也是身谏。这段分析，诚如作者

所说,是折磨人的文字,不堪回首。

在《后记》中,作者经过了思维长途的跋涉终于发出这样的浩叹:“老舍把生命交付给了文学,又曾经为了国家至上的信仰把文学交付给了政治”,终于在无奈的困顿和迫压中倒下了。

这是一本讲述老舍思想发展过程的书,又是总结一个作家如何从生到死、从昂扬到迷惘到消亡的书。它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曲折及其悲剧性;它也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正义感、才情和睿智。

绪 论

写下“世纪彷徨”这个题目,心中还是充满了疑惧。我是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后才给它们定总题目的,这基本上是中学里作文课的一个恶果:这样先有了内容再构思名字难免会导致内容的芜杂和题目的空疏。

但是我终于还是用了这个略显空疏的题目,也许只有这样空疏一些才有可能涵盖这一部无论是论述还是引证都显得有些缺乏节制的论著吧?

在这些年爬罗有关老舍的史料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老舍的复杂。这复杂不单单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也明确地体现于他的生平、思维方式、立身方式。这一些,有的,恐怕将永远湮没不彰了;有的,是我力所不逮的;有的已经前辈学人讲了许多,可以说非常充分了;我做的,或者说企图做到的,是余下来,我认为我应当,也可以做出一些眉目来的工作,即从关系中看老舍,从心态史看老舍。这“关系”,我选择的是老舍之作为老舍首先遭遇的一层关系,那就是老舍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系——毋庸置疑,老舍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所以说,老舍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系是他和世界,和历史的第一层基本关系。而老舍一生起伏不定的心态,那直接作用于他的文

学创作的人格心理、文学理念,以及最终导致了老舍之死的背景因素之纷烦复杂,断非一个词语所能概述。一定要概述,——论文总是要一个总题——我只好选择“彷徨”这个词。这样,把两项写作企图合起来,就是现在这个题目。

彷徨是一种不定的状态。我以为,老舍一生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度过的。这并不是说老舍时时刻刻都没有主见,凡事犹豫。恰恰相反,老舍的个性是非常强硬的。这从他的断然投水即可以见出。老舍的彷徨,主要是一种文学理念上的冲突和某种必须抉择的压力造成的。这文学理念的冲突,指的是自由主义文学观和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矛盾;压力,则同时来自外界和内心:从外界看,20世纪动荡不居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老舍走过的那三分之二,不能容许自由主义文学因素健康发展;从老舍内心看,他的士大夫气质、国家至上主义、使命感、宗教情绪也都阻碍了他毫无牵挂地安心做一个游离于时代命题、大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作家。

樊骏先生有文《老舍的“寻找”》(1987年《文史哲》第4期),以“寻找”二字概括了老舍一生的山难水险。我这里用的“彷徨”,指的正是这种包含了“寻找”的彷徨。老舍生命历程和文学历程的起伏,紧紧地系联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伏、中国文学史的起伏、老舍自己文学理念的摇摆,也正是这种包含了“寻找”的彷徨的过程。在本书中,我更多地用了“回归”这样的表述,指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老舍生命中有几个年份是尤其须引起注意的。它们分别是1924年、1937年、1941年、1949年、1956年、1966年。1924年是

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的年份,那一段远离故土的日子成为老舍开始自觉的文学创作的直接导因。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在那一年断然结束了自己在山东的自由作家生涯,以“国家至上主义”为最高和惟一趋赴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功利主义的写作方式。1941年前后,老舍在写作遭遇的顿挫和抗战文艺界的数次论争的环境中进行自己文学生涯中第一次全面反思,并且终于在创作的题材、体裁、风格上达成了回归。1949年老舍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启程回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中国时期,而从抗战时期就开始熟悉的一些写作方式到了新中国时期则易作了必须遵循的写作准则,因此,1949年也是老舍再次返回到文学功利主义的标志性年份。1956年在“双百”春风中老舍开始他生平的第二次全面反思,自此老舍的反思和回归又历经几次小的反复,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点。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年份,也是老舍之死发生的年份。老舍是“文革”中最早走绝路的作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作家中被公认在新中国时代创作最用功、作品最多,也是事实上作品质量最高的一个作家。因此,老舍之死就不仅仅是老舍研究的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课题,更从根本意义上关涉文学史和作家心态史研究。老舍之死是老舍一生走走停停、反反复复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彷徨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老舍个人的人格理想、气节观念、性格因素、晚年心态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研究也就是老舍之死的研究。在1999年纪念老舍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舒乙先生谈到,在为纪念老舍诞生一百周年举办的征文活动(北京日报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中,“没有一篇稿子不谈老舍之死”,这近乎证明,“在

老百姓心中,老舍等于老舍之死。”^① 民间的反馈相信对于学术界不无启迪意义。本书的基本企图,就是通过对老舍一生的三个重要阶段的解读,尽量摒去意气之论,给老舍之死提供一些合理和全面的解释。

这三个阶段,就是老舍创作的高潮期山东时期(1930—1937年)、全面转折期抗战时期(1937—1946年)和滑坡期新中国时期(1949—1966年)。我不希望我这里的定义引起什么不必要的争议,因此在绪论里对此尽可能先作一些解释。

山东时期作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似乎不必作太多的解释。老舍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身兼教授和作家两种身份:学期内教书,因而有了《文学概论讲义》等理论成果,并且利用零星时间作了不少短文,而更重要的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假期内则创作长篇小说,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暑假就可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在山东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中,老舍的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有保证。我们今天公认的老舍的代表作中,除了《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其余的都是山东时期创作的。这就使得山东时期名至实归地成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山东时期作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山东时期的创作从总体上呈现了一致的成熟的写作风格。老舍的文学创作从起步开始就有一种对幽默风格的自觉追求,早期有时不免失之于单薄。在山东时期,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的深入,这种幽默的追求日渐成熟了起来,并且有了一些恒定的理论作为保障。老舍的幽默第一得自于心性,第二得自于北

① 1999年2月5日下午闭幕式上舒乙的发言。

京底层旗人的出身,第三得自于英国幽默传统的激发,第四得自于对世界的细致体察和敏锐反应,第五得自于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可以说是多种机缘集于一身一体才得以成就。因此我用了“弱水三千一瓢饮”的比喻,想借以说明这样的文学风格的得之不易,和老舍认定了这种文学风格之后的无怨无悔。许多事实表明,和老舍的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关键词正是“北京(北平)”和“幽默”。前者确证了老舍的原初身份对他一生的影响。正如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湘西之于沈从文,北京之于老舍有一种系乎血肉的关联,这种关联造就的是老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创造的不世的建树。后者,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一定角度分析还是前者造就的,因此更加值得分析。幽默作为北京满人传统风习中不可或缺的一层性格特征,与老舍北京人的身份更是一体的。只有认明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明确认识,为什么当“幽默”在30年代文坛被当作异端横遭非议的时候,老舍还是那么理直气壮地为幽默辩护。同时必须考虑的背景事实是,老舍当时虽然在文坛已经据有了崇高的声望(这从老舍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左、中、右各种重要杂志的重点地位上这一点即可见出),但是于文坛的各种争论一直是取旁观态度的——这种旁观态度同时也是幽默写作必须具备的一种心理态度。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我把对山东时期的解读重点放在对老舍幽默写作的解读上。在最初的写作过程中,“山东时期论”同时被命名为“老舍幽默论”。

抗战时期是老舍创作的全面转折期。之所以说是“全面”转折,因为老舍的创作已经出现过与抗战这一转折相比略显纤小的局部转折(如《小坡的生日》对政治的关注、《猫城记》“故意的

禁止幽默”^①、《离婚》的“返归幽默”和“求救于北平”^②），而抗战时期之后还将要出现一些转折。但就老舍一生而言，抗战才是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它的承前启后的特性，它的突如其来、天翻地覆的征兆，无不蕴含着可供镜鉴的资源。作为全面转折，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体现出如下特点：一、以实用为目的，对通俗文艺形式倾注满腔热情，曲艺和时事剧一度成为首选文体；二、同样以实用为目的，开始尝试话剧创作；三、创作题材和写作风格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为了实用的目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上放弃了北平题材和幽默风格；四、从此开始与政治密切结合，也开始了大多数 20 世纪中国作家先后经历的“向左转”。这一系列互相助成的转折是老舍个人意志的选择，也与时势紧密关联。又是出于一个职业写家的自觉，在 1941 年前后，老舍通过一系列自我检讨和自我修正，实现了向文学自由主义的回归，从而以《四世同堂》等文学实绩再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四世同堂》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证实了老舍严苛的自我要求，并且以它对北平市民心态和市井民情的精彩描绘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小说。并且，《四世同堂》漫长的写作过程正应和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又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高潮。《淘金记》（沙汀）、《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长河（第一卷）》（沈从文）、《风萧萧》（徐訏）、《寒夜》（巴金）、《围城》（钱锺书）、《结婚》（师陀）、

① 《我怎样写〈猫城记〉》，1935 年 12 月 1 日《宇宙风》第 6 期，《老舍文集》第 15 卷第 18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版。

② 《我怎样写〈离婚〉》，1935 年 12 月 16 日《宇宙风》第 7 期，《老舍文集》第 15 卷第 191 页。